



# 一方铜墨盒见证红岩岁月中的革命友情

□王祥婷 丁英顺

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方略显陈旧的圆形墨盒，直径11厘米，高3.2厘米，白铜铸造，做工讲究，篆刻精细。铜墨盒带盖，盒面上款题写“之光同志留念”，镌刻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后赤壁赋》，小楷，底铭“北京同古堂”。文末落款“李克农、叶剑英、徐冰敬赠”。

这是抗战胜利后，李克农、叶剑英、徐冰合赠给钱之光的礼物。钱之光后来一直携带身边，直至1959年4月捐赠给红岩革命纪念馆。2012年，此墨盒被重庆市文物鉴定组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那么，在当年战火纷飞的时代，是什么原因促使几位革命先贤特地予礼相赠呢？这方铜墨盒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铜墨盒的主人钱之光（1900—1994），浙江诸暨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后创办商业大学，任校长。领导各贸易分局突破敌人封锁，广开通商渠道，保障了军队供给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先后担任八路军驻武汉、重庆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南京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等

职务。后被派往香港创办华润集团，担任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轻工业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

钱之光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全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从1937年8月到1947年3月整整10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钱之光始终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以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上层与基层紧密配合的方式，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在皖南事变、重庆谈判等许多重大事件中，始终英勇无畏、胆大心细地站在险境第一线，恰当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当局合作斗争的复杂政治关系，战胜一个又一个重大困难。

尤其是作为各地公开的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要处理办事处繁杂的日常事务，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弹药到通讯器材等重要物资筹措运输；从办事处到地下党的经费筹措，到在经济上帮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从向延安输送物资和接送干部，到为许多同志和烈士寻找亲人、沟通音讯、抚养家属子女等，都事无巨细地谋划运作，出色完成任务，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也正是在国统区的十年斗争中，钱之光与同样坚持在国统区战斗的叶剑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组组长）、李克农（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徐冰（南方局文化组

组长）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尤其在重庆红岩时期，以钱之光为处长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受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的严峻考验。钱之光与叶剑英一起经历了两次反共高潮。尤其在皖南事变中，叶剑英、钱之光协助周恩来一起战斗在最前线。由叶剑英和南方局军事组成员编印、周恩来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就是由钱之光用皮箱提到曾家岩周公馆派人散发，有一部分还巧妙地直接送到国民党高级官员手中。皖南事变后，叶剑英率南翔、李涛等人返回延安。同时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先后被撤销。1941年1月22日，李克农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离开桂林，跨越国民党设置的严密封锁线，突破层层关卡，抵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而后回到延安，投入新的战斗。周恩来风趣地将李克农比作古时关云长，赞其千里“单骑”走重庆。

而徐冰作为周恩来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在团结文化界、科技界以及民主党派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整个全民族抗战时期，徐冰与钱之光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一直坚持战斗在红色三岩，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工作任务。

1945年12月，中央恢复南方局（或称重庆局），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徐冰、钱之光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国统区工作。另外组成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组成，负责赴重庆谈判和出席政协会议，李克农任代表团秘书长。这样四人又重新一起战斗了。

1946年1月，根据重庆谈判签署的《双十协定》的规定，国共双方初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根据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和美国政府各派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资料图）

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受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叶剑英任执行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李克农任代表团秘书长，徐冰为政治顾问。同年5月，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率领中共代表团、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到达南京，南方局改称南京局。钱之光任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处长、南京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

就这样，钱之光与叶剑英、李克农、徐冰等人再次走上新的革命岗位，肩负新的使命。1946年，李克农、叶剑英、徐冰三人在北平军调处工作时，特地定制了当时特别流行的铜铸墨盒，托人带到南京梅园新村，一件给了钱之光，另一件送给了董必武（现收藏于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以此见证共产党人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团结携手，共克时艰，以笔墨书信相联，用勇气和智慧接续谱写的一首壮烈友谊诗篇。

# 藏龙卧虎的民生机器厂

□卢晓蓉

1928年卢作孚在重庆江北青草坝选址，兴建了主营船舶修造、兼营机器制造外销的民生机器厂。在此之前，航行川江的客货轮船，无论是大修或中修，都要到武汉、上海才能解决，更不用说自己造船了。民生公司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决定自己建厂。首任厂长陶建中，曾是民生公司第一艘船“民生”轮的经理。1926年夏，他带队到上海接船回重庆，行至三峡著名险滩“洄滩”时，因船小浪急，差点翻船，专程到宜昌接船的卢作孚这时也大惊。陶建中事后回忆：“作孚于皇急中，奔至机舱，令开倒车，大有‘羞见江东父老’之慨。”后有船员急中生智，跳入河心绞滩，才免于遭难。“民生公司之成败，系此须臾”。后来陶建中曾四度出任民生厂厂长，并为之共沉浮。1928年冬，民生机器厂正式开工。不久以后，它便成为重庆乃至四川最大的民营机器厂，抗战期间亦是后方最大的民营机器厂。青草坝也因此而声名远播。

青草坝方圆不过两里地，既无楼堂馆所，也无风景名胜，只是一座普通的丘陵。卢作孚看不上这个地方，图的是它所处的位置，方便航行在两江流域的轮船停靠，而且它临近朝天门码头，自然成为了重庆的门户。更主要的是依山傍水，河滩开阔，便于停泊和修造船只。冬天枯水季节，堆上木墩就能作业；夏天洪水季节，铺上浮筒船坞便可开工。与现代化的大型船厂相比，条件不免简陋，但有了这个舞台，民生公司的修造船业便可大展宏图。青草坝山的好处在抗战时期显现出来。当时的民生机器厂硬是在石头山内凿开了一个可容纳千余人、既能躲避空袭，又能坚持生产。

船厂最初成立的时候，只有4台车床、10余个职工。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便不断扩大，到全民抗战爆发前，职工已近300人，机器也增加到40多部，包括车、刨、铣、钻，应有尽有。年修船量也从1928年的2艘，增加到1936年的28艘。

民生机器厂的长足发展，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壮大民族航业的发展战略相辅相成。1932年5月“万县惨案”的罪魁祸首——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轮因触礁沉没，没有一家专业公司能将它打捞出来。卢作孚派专家对沉船作了仔细勘察后，以世人所不敢为的胆略，买下这艘价值60万两白银的大船，并将其打捞上来，拖回民生机器厂大修及加长，改名为“民权”轮。抗战期间，功勋卓著的民生公司船队中就闪耀着“民权”的旗帜。

到公私合营前，民生机器厂一共换了4位厂长。除陶建中累计任职时间最长外，就数在全民抗战时期担任厂长的周茂柏了。周茂柏是武汉机械工业世家周恒顺家族成员，曾留学德国主攻船舶机器制造。全民抗战爆发后，周恒顺机器厂决定迁往重庆。卢作孚得知，立即表态由民生公司负责其运输。后来两家企业合组了“恒顺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周茂柏被卢作孚诚聘为民生机器厂厂长兼该公司经理。全民抗战期间，周茂柏率领全厂职工，奋勇承担了川江绝大多数的船舶维修任务，前后不下1000艘次。不仅修船，还要改造旧船、打捞沉船、建造新船，从1939年到1943年就造船19艘，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抗战运输。

鼎盛时期的青草坝可谓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他们不是毕业于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吴淞商船学校等名校，就是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高手，如负责打捞“万流”轮的领队，就是厂里的工务主任张干霖。到全民抗战时期，民生厂更是敞开大门，接纳了许多至今在航运界还如雷贯耳的技术专家，如叶在夔、吴龄经、郭子植、叶裕、张治等。从周茂柏著《抗战第六年之民生机器厂》可知当时该厂福利待遇之一二：“除优给薪资外，并加给生活津贴，食米津贴以及各项奖金特酬”，日常生活“则有消费合作社为之供给油盐柴炭”，“一切日用品，均拟以廉价供给”；孩子教育，“则有职工子弟学校，免费招收职工子弟就学”；工厂安全和员工医疗“均有特殊之设备，以达到生活安谧之地步”。在青草坝这个战火中不可多得的温馨家园里，专家和职工们怎能不“工作勤奋，乐群敬业”！全民抗战结束后，这支渗透着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现代科学知识的人脉，继续引领着民生厂的高端水平。

（作者系卢作孚长孙女）

# 谚语中的小满

□缪士毅

小满已至。《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此时，我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已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因而称小满。而南方地区的农谚往往将小满的“满”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在漫长的岁月中，小满节气逐渐形成了不少与气候、农事等有关的谚语，尽管谚语受地域、物候等因素影响，但都是劳动人民实践的总结，朴实无华，独具韵味。

小满谚语，有的反映未来天气走向，如“小满无雨，芒种无水”“大雨下在小满前，农民不愁水灌田”“小满不满，干断田坎”，等等。这些小满谚语是人们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通过不断观察气象得出的经验总结，对小满之后的天气情况有一定的预示作用。比如华南地区有一谚语“小满大满江河满。”反映了这一地区小满时节降雨多、雨量大的特征，提醒人们小满节气到了，防汛又该处于紧张阶段。

小满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事节点，与农业生产紧紧相连，有的谚语催促人们抓紧播种耕作或田间管理，如“小满天赶天，芒种刻刻赶”“小满前后，点瓜种豆”“小满节气到，快把玉米套”“小满小满，麦粒渐满”，等等；有的谚语反映夏收农作物已经或接近成熟，如“小满见三鲜：黄瓜、樱桃和蒜苔”“小满见三新：樱桃、黄瓜、大麦仁”“小满桑葚黑，芒种小麦割”“大麦不过小满，小麦不过芒种”，等等。这些小满谚语至今仍为人们所用。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还认识到小满天气对日后农林植物或渔业收成的影响，并将其反映在小满谚语之中，如“小满有雨豌豆收，小满无雨豌豆丢”“小满过后温度升，时时注意防鱼病”“小满大风，大树要空”等。比如黄河中下游有谚语“小满不满，麦有一险。”这“一险”就是小麦在此时进入乳熟阶段，易遭干热风的侵袭，从而导致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干瘪而减产。为此，提醒人们要采取应对措施，防止小满时节因出现干热风而对小麦的损害。

总之，这些谚语从侧面道出了小满天气对农林渔生产收成丰歉的影响，通俗易懂，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 画家笔下的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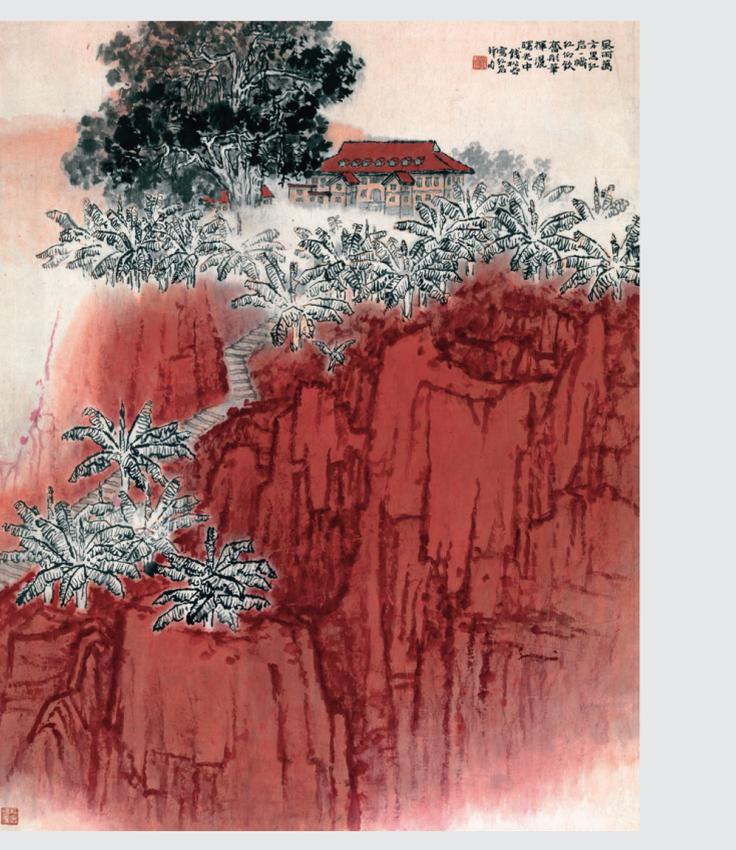
# 红岩

【作者】

钱松喆（1899—1985），江苏宜兴人。从高祖到父亲四代都以教书为生。钱松喆自小就受到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良好教育。是中国现代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之一，新金陵画派领军人物，曾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赏析】

《红岩》是新中国山水画创作的经典之作，是钱松喆在写生途中根据重庆红岩村的景色，经过大胆想象和艺术加工而创作完成的作品，歌颂了“红岩精神”，即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以及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画家满怀对这种革命精神的崇敬之情，以朝圣般的情感，大胆运用色彩，将画面中一整块岩石勾画完成后，以朱砂罩染，渲染出一种奔放而壮美、充满革命信仰的精神景观。此作立意新颖，结构谨严，双勾的芭蕉和曲折的石径与画面上方用浓墨点染的远树以及大块面深红色岩石巧妙组合，构成了画面虚与实、整与破、明与暗的矛盾关系，既表现了以形式语言所营造的崇高之美，又饱含了对实景山水的描绘，正所谓“气质俱盛”，以山水画展现了时代精神。钱松喆是中国现代山水画的大家，他以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屋漏痕”，写山石树木，水云房舍，古朴凝重，自成一格。而且诗文修养深厚，题画诗佳作频出，书法老辣奇拙，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 “尚武”的川东人

□陈世松

生活居住在川东北丘陵地区的居民，即所谓巴人（包括今重庆人和一部分四川人），原本是一支以狩猎为主的民族，只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被楚人所逼，才辗转从湖北宜昌清江流域一带，逐渐迁入今川东丘陵地区。其后，巴人较长久地保持着山地农耕兼渔猎部落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历史上一支强悍的以战斗为职业的部落。艰险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锻炼了巴人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坚强、直率的心魄。因此，“尚武”成为这一地区居民的个性特点和文化品格。

在川东这块相对贫瘠的土地上，虽然不生产以文章著称的文人学士，但却造就了不胜枚举的铮铮战将。东周时巴国将军蔓子，为了保全巴国江州城池，甘愿割下自己的头颅，让楚使带着人头回国复命，表现

了巴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三国时巴郡守将严颜，为张飞所擒。张飞劝他投降，严颜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回答说：“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张飞大怒，严颜又嘲笑说：“砍头便砍头，为啥要暴跳如雷？”如此这般，句句掷地有声。

此区人质朴敦厚，有先民的流风余韵。《华阳国志》记述巴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重迟鲁钝”；“无造次辨丽之气”。三国时巴西（现西充）人谯周初次见诸葛亮，因“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不善交际，说话时引起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不止。等谯周离开后，执法官要对发笑的人刑之以法，诸葛亮劝阻说：“连我都忍不住要发笑，何况左右的？”宋代渠江人、经学家黎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深得欧阳修的器重。但他“为人质木迟缓”，因此被

人戏呼为“黎椰子”。黎不知其意，后经苏东坡写信点醒，椰子乃是一种果木，在苏东坡寓居的海南岛，就有这种果树，“霜实累累”，正在结果。言下之意，其为人有如椰子一样木质迟钝。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作为巴人后裔的川东人和重庆人，待人热情豪爽，遇事仗义行侠，直来直去，口中有话不藏在肚皮头，这多少继承了他们祖先的遗风。

此区方言明显受荆楚方言的影响发音急促，节奏快而有力，说话落地有声，干脆豪放。巴渝方言，特点明显。由于“喉牙混呼”，即喉音、齿音发音不清，所以“鱼”为“余”，呼“语”为“雨”，呼“遇”为“豫”，呼“疑”为“喻”，呼“宜”为“离”，呼“娘”为“良”。川东人爱说的口头禅“崽儿”，源于湖南方言；“啥子”，则源于川楚

间的俗语“舍子”。“舍”乃古词，犹言何事。

重庆学者邓廷良在《丝路文化·西南卷》中，对重庆人、川东人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重庆人——巴人——优点在于重群体讲义气，勇于走险，而行为能力极强。不过，这些优秀品质，恰恰都是贫瘠的生活环境逼出来的。陡峭的山林、贫瘠黏湿的红壤黄泥，火灼般炎热的气候加上夏旱秋涝……在这里，艰险历来与生活共存。艰难的生计、险恶的路程、炎热的气候，以及数千年的传统，造就了巴人急躁爽直而又行为能力极强的气质……无怪乎川东历史上仅出过几位默默无闻的状元，但战将却不胜枚举，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就产生了朱德、刘伯承、聂荣臻三位赫赫有名的元帅。”